



中國近代 檔案學期刊輯錄

孫彥 梁繼紅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責任編輯：孫 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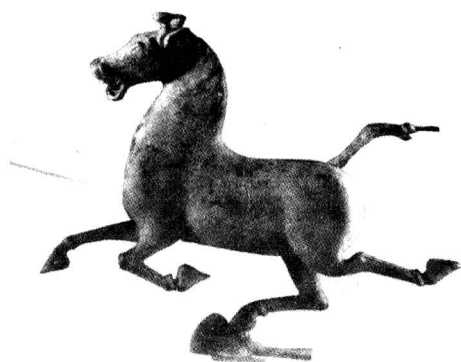
封面設計：九雅工作室

定價：1080.00圓（上、下冊）

中國近代 檔案學期刊輯錄

上 冊

孫彥 梁繼紅編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圖書在版編目(CIP)數據

中國近代檔案學期刊輯錄 / 孫彥, 梁繼紅編. —北京: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 2010. 2
ISBN 978 - 7 - 5013 - 3824 - 5

I. ①中… II. ①孫… ②梁… III. ①檔案學—期刊—彙編—中國—近代
IV. ①G279.295

中國版本圖書館 CIP 數據核字(2010)第 019594 號

責任編輯: 孫 彥

封面設計: 九雅工作室

ISBN 978-7-5013-3824-5



書名 中國近代檔案學期刊輯錄(上、下冊)

著者 孫彥 梁繼紅編

出版 國家圖書館出版社(100034 北京市西城區文津街7號)
(原北京圖書館出版社)

發行 010 - 66139745, 66175620, 66126153
66174391(傳真), 66126156(門市部)

E-mail btsfxb@nlc.gov.cn(郵購)

Website www.nlcpress.com → 投稿中心

經銷 新華書店

印刷 河北三河弘翰印務有限公司

開本 787 × 1092 (毫米) 1/16

印張 95

版次 2010年2月第1版 2010年2月第1次印刷

印數 220(套)

書號 ISBN 978 - 7 - 5013 - 3824 - 5

定價 1080.00 圓

近代明清檔案整理與機關文書檔案改革

從檔案學發展史來看，近代意義的檔案學是從二十世紀初期開始的。從二十世紀初到一九四九年新中國建立之前，西方學科觀念、學術思維和方法，以及新材料的大發現和社會的大變革等，推動中國檔案學以不同於傳統的面貌出現。這一時期是中國檔案學發展史上的近代時期。近代檔案學研究成果比較豐富，除了專門著作之外^①，還有一些專篇論文討論檔案學問題。這些論文在近代許多刊物上都有刊載，例如當時編輯出版的《行政效率》（後改為《行政研究》）、《圖書館學季刊》、《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季刊》、《中法大學月刊》、《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故宮博物院年刊》、《輔仁學志》、《嶺南學報》，以及《文獻特刊》、《文獻論叢》和《文獻專刊》等。近代出版的主要檔案學專著建國後又翻印再版，閱讀較易，而發表在期刊上的文章比較分散，檢尋不易。為了方便讀者瞭解和研究近代檔案學，我們特別選擇其中比較集中討論檔案學問題，並近年來未集中再版，不易收集的幾種期刊影印再版，名之為《中國近代檔案學期刊輯錄》。

（二）近代檔案學研究成果中的專門著作，以一九五八年中國人民大學歷史檔案系翻印民國時期出版的十三本檔案學舊著為典型代表，即周連寬的《文書處理法》和《檔案管理法》、程長源的《縣政府檔案管理法》、徐望之的《公牘通論》、何魯成的《檔案管理與整理》、龍兆佛的《檔案管理法》、陳國琛的《文書之簡化與管理》、黃彝仲的《檔案管理之理論與實際》、梁上燕的《縣政府公文處理與檔案管理》、傅振倫的《公文檔案管理法》、秦翰才的《檔案科學管理法》、許同莘的《公牘學史》、殷鐘麒的《中國檔案管理新論》。此外，還有周連寬、孔充的《縣政府文書處理法》、《縣政府檔案處理法》、私立文華圖書館學專科學校油印教材，如毛坤的《檔案經營法》、《檔案行政學》、《檔案編目法》、汪應文的《檔案分類法》等講義。可惜，這些講義沒有能够出版。

選入《中國近代檔案學期刊輯錄》的刊物有：北平研究院社會調查所編輯的《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一九三四年五月第二卷第二期『明清檔案專號』，南京國民政府行政院行政效率研究會編輯的機關刊物《行政效率》一九三五年五月第一卷九、十期合刊『檔案專號』，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編輯的不定期檔案學術刊物《文獻特刊》（故宮博物院十週年紀念刊，一九三五年十月印行）、《文獻論叢》（故宮博物院十一週年紀念刊，一九三六年十月印行）、《文獻專刊》（故宮博物院十九週年紀念刊，一九四四年十月印行）、《文獻專刊》（故宮博物院二十週年紀念刊，一九四五年十月印行）、《文獻論叢》（沈兼士先生紀念刊，一九四八年十月印行）。按照編輯出版的時間順序進行編排。從內容上看，這些期刊所收論文主要分為兩類：一是關於明清檔案整理和研究的，《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明清檔案專號』和《文獻特刊》、《文獻論叢》和《文獻專刊》即屬此類，一是關於機關檔案工作的研究的，《行政效率》『檔案專號』即屬此類。這兩類論文是民國時期檔案學研究的兩個主要領域。為了便於讀者閱讀論文，下面我們將較為詳細敘述這兩類論文撰寫的學術背景，並簡要介紹收錄本書的刊物及其內容。

一 近代明清檔案整理運動與《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明清檔案專號』及《文獻特刊》、《文獻論叢》、《文獻專刊》

十九世紀末至二十世紀二三十年代是中國學術史上的大『發現時代』。一九二五年，王國維在《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的講演中說：『自漢以來，中國學問上之最大發現有三：一為孔子壁中書，二為汲冢書，三則今之殷墟甲骨文字，敦煌塞上及西域各處之漢、晉木簡，敦煌千佛洞之六朝及唐人寫本書卷，內閣大庫之元、明以來書籍檔冊。此四者之一，已足當孔壁、汲冢所出，而各地零星發見之金石、書籍，於學術有大關係

者，尚不與焉。故今日之時代，可謂之「發見時代」，自來未有能比者也。」^{〔一〕}清代內閣大庫明清檔案的發現，是近代史料四大發現之一。

清沿明制設立內閣。在雍正以前，內閣是清代行政運轉中樞。皇帝詔令、臣僚章奏皆通過內閣頒發、承轉。內閣大庫位於故宮東南舊內閣衙門東，所藏主要為清代為編纂明史而收集的明代檔案、盛京舊檔、清代歷朝詔令題奏等檔案以及圖籍等。雍正設立軍機處後，內閣地位雖下降，但內閣大庫所藏檔案圖籍一直深藏大內，即使是九卿翰林也無由得見。^{〔二〕}宣統元年（一九〇九），內閣大庫年久圯壞，因之將大庫檔案移至文華殿兩廡暫存。此時，內閣大庫檔案曾因「舊檔無用」，閣議以焚燬。幸而時任學部參事的羅振玉上書張之洞奏請罷毀，纔使之免於火劫。大庫檔案得以移出，歸學部管理。一九一三年，北洋政府教育部設立歷史博物館籌備處，將內閣大庫檔案劃歸其管理。歷史博物館將大庫檔案移存在故宮午門、端門門洞之內。後歷史博物館將整齊檔案檢出，遷至午門雁翅樓，剩下檔案仍存原處。一九二一年，歷史博物館因經費困難，將剩下檔案計約八千麻袋以四千元的價格售予北京同懋增紙店，以做還魂紙的原料。一九二二年，羅振玉個人斥貲，以三倍的價格從紙商手中購下，再一次保全檔案，使之免於水劫。此即歷史上有名的政府出賣檔案的「八千麻袋事件」。「八千麻袋事件」，對於近代中國明清檔案而言，確是一件不幸的事件，它直白地刻畫出了政府對傳統檔案文化的漠視，甚至是無知的一幕，但也有其幸運的一面，「八千麻袋檔案」的被賣與買，其結果直接引起了社會學術界的重視，是清代內閣大庫檔案被學術界「發現」的開始。

二十世紀初期，西方科學主義思潮逐漸在中國的思想界佔據主導地位。王爾敏在《史學方法》一書中分析其原因說：『就是由於近代西方知識技術之衝擊，使中國產生了西方優越觀念，跟著來了慕趨西方，力求西化觀

〔一〕 王國維：《最近二三十年中中國新發見之學問》，《王國維集》第二冊，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二〇〇八年，第三〇八頁。

〔二〕 王國維《庫書樓記》謂：「然三百年來，除舍人省吏循例編目外，學士大夫罕有窺其美富者。」（《王國維集》第二冊，第三三三頁）

念。西方知識，以科學發展最見突出，也使中國產生了一個籠罩全局的科學主義。』^①科學主義思潮影響中國的思想學術界，其中尤以實證主義為代表。實證主義能夠為當時學術界所普遍接受，還在於當時的中國具備接受它的積極土壤——清代傳統考據學的影響^②。因此，學術研究注重尋求證據，考辨材料，蔚成風氣^③。沈兼士在《方編清內閣庫貯舊檔輯刊序》中說：『以為向來文士盡信書之弊，當有以矯之。故研究所國學門於古代研究，則提倡考古學，注意古器物之採集；於近代研究，則側重公家檔案及民間風俗。持此縱橫兩界之大宗新資料，以佐證書記之研究，為學者辟一新途徑。』^④

明清檔案作為明清史研究的第一手原始材料，受到學術界的普遍重視。這樣，在中西學術激盪交融的環境下，當『八千麻袋事件』發生後，學術界開始投入到了明清檔案的保護、收集、整理工作中來，逐漸形成了二十世紀二十至三十年代第一次明清檔案史料整理公佈高潮。當然，這不單是學術研究的需要，也是保護祖國文化遺產的迫切需要。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故宮博物院文獻館、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清華大學歷史系、禹貢學會等多個學術文化機構和團體相繼參與到了明清檔案整理事業之中，並發展成為一場學術運動。

一九二二年，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成立，設在『三院，即東安門北河沿清朝末年所籌建的譯學館舊址』^⑤。

① 王爾敏：《史學方法》，臺灣東華書局，一九七七年，第二一二頁。

② 顧頤剛在談到當時史學進步的原因時說：『首先是因為西洋的科學的治史方法的輸入。過去的乾嘉漢學，誠然已具有科學精神，但是終不免為經學觀念所範圍，同時其方法還嫌得傳統，不能算是嚴格的科學方法。要到五四運動以後，西洋的科學的治史方法纔真正輸入，於是中國纔有科學的史學可言。』（見顧頤剛《當代中國史學·引論》，遼寧教育出版社，一九九八年）顧頤剛將『西洋的科學的治史方法』的傳入和運用，列為近代史學進步的首要原因。

③ 沈兼士在《方編清內閣庫貯舊檔輯刊序》一文中說：『溯民國二十餘年間，北京大學之於研究國學，風氣凡三變：其始承清季餘習，崇尚古文辭；三四年之後，則倡樸學；十年之際，漸漬於科學，駁駁乎進而用實證方法矣。』（見沈兼士《沈兼士學術論文集》，中華書局，一九九〇年，第三四三頁。）

④ 沈兼士：《沈兼士學術論文集》，第三四三頁。

⑤ 單士元：《回憶陳援庵師》，《故宮札記》，紫禁城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第一六二頁。

聞知羅振玉購買內閣大庫檔案的消息後，國學門主任沈兼士和陳垣、馬衡、朱希祖等諸教授謀劃，決意將大庫劫餘檔案移歸北大研究所國學門整理。其間經蔡元培的斡旋，北大最終接收、裝運了六十一箱一千五百零二袋內閣檔案。北大研究所國學門開啓了近代學術機構整理明清檔案運動之端緒。研究所國學門爲整理大庫檔案，成立清代內閣大庫檔案整理委員會（不久改稱爲明清史料整理會），該會簡稱整理檔案會。整理檔案會由國學門與史學系、國文兩系的教職員組成。其成員有：余文燦、沈兼士、陳垣、朱希祖、馬衡、馬裕藻、沈士遠、程樹德、單不庵、陳漢章、張鳳舉、李泰棻、楊棟林、魏建功、王光瑋、胡鳴盛、王有德、皮宗石、潘傳霖、張伯根等^①。經過整理檔案會集體商討，製訂北京大學整理檔案的方法。據《北京大學研究所國學門一覽》，北大初期計劃對內閣大庫檔案的整理分爲三個步驟：

第一步 形式分類及區別年代。形式分類則分膳黃、敕諭、誥命、實錄、試卷、表、題本、報銷冊……等類；年代則分天啓、崇禎、順治、康熙、雍正……等朝。

第二步 編號摘由。如題本、報銷冊兩項，爲檔案之大宗，並多係重要史料，故先着手。題本則就內容摘錄年月、機關，或區域及事實因果情形。再以事實性質歸成若干總類（如命案、盜案、錢糧、俸餉、建築、財政、軍政、學政、國際事件……等目）。總類之下，又分細目（如命案中分因姦謀殺、因仇謀殺、因戲謀殺……等目）。然後編號上架。報銷冊則摘錄年月、機關，或區域及名目，大別之有地丁漕米、旗營軍餉、墾牧、建築、濬治、清丈、鹽引、課稅、織造、鼓鑄、物價、給發勘合火牌、內府食品、支用柴炭煤斤、案件匯總及大進、大出黃冊各類。至於各項檔案中之特別重要者，隨時提出公佈。

第三步 報告整理成績。研究考證各重要事件及分別編製統計表。凡各項已編號摘由之檔案，分別編目。或錄全文登載本校日刊公佈。其他如大政變、文字獄及一切史乘不詳之事件，則加以考證，編爲報告。題本、報

（二）參見陳以愛：《中國現代學術研究機構的興起——以北大研究所國學門爲中心的探討》，江西教育出版社，二〇〇二年，第一〇九頁。

銷冊分類後，即編成各地風俗狀況、犯罪行為、歷朝對於人民之待遇、物價之比較……等統計表。即無甚重要之賀表、會試卷……等，將來亦擬利用之以編成歷朝職官人名表、地方文風統計表，其餘如公文程式及文字遞變之調查，歷朝官印之編譜，皆擬酌量緩急，分別進行^(一)。

然從實際執行來看，由於經費困難等原因，後來北大並未能完成上述三個步驟，所做工作主要在前兩項^(二)。北大除了整理檔案外，還編印檔案史料書刊以及舉辦檔案展覽。北大先後編輯出版檔案史料目錄書刊有：《整理清代內閣檔案報告（要件）》（一九二四年，三冊）、《整理清代內閣檔案報告（題本）》（一九二四年，一冊）、《整理明清史料要件報告》（一九二四年，一冊）、《清九朝京省報銷冊目錄》（一九二五年）、《嘉慶三年太上皇起居注》（一九三〇年，四卷）、《順治元年内外官署奏疏》（一九三一年，一冊）、《明南京車駕司職掌》（一九三四年，一冊）、《崇禎存寶疏鈔》（一九三四年，八卷十六冊）、《洪承疇章奏文冊匯輯》（一九三五年，一冊）等^(三)。一九二五年以後，沈兼士兼職故宮博物院文獻館，不再主持北大國學門明清檔案整理，他對北京大學整理明清檔案的整理方法作了深刻的總結。他認為北大整理檔案：一、太重形式，只知區別名稱，排比時代，而忽略檔案的內容。二、只知注意檔案本身，而忽略衙署職司文書手續之研究，遂使各類檔案，均失掉它們的聯絡。三、過於注重搜求珍奇史料，以資宣傳，而忽略多數平凡材料之普遍整理^(四)。儘管缺點不少，但這畢竟是近代學術機構整理明清歷史檔案的開始，為以後明清檔案整理，尤其是故宮博物院文獻館明清檔案整理積累了初步經驗。

故宮博物院文獻館是近代從事明清檔案整理的最主要的文化學術機構。辛亥革命推翻了清朝統治，清帝遜

(一) 轉引自方蘇生：《整理檔案方法的初步研究》，《故宮博物院年刊》，一九三六年，第七七—七八頁。

(二) 關於北京大學整理內閣檔案的詳細記述和評價，讀者可參看時人趙泉澄所著的《北京大學所藏檔案的分析》，《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一九三四年五月第二卷第二期。

(三) 參考鄭天挺《明末農民起義史料》序，《清史探微》，北京大學出版社，一九九九年，第一五六頁。

(四) 參見沈兼士：《文獻館整理檔案報告》，《文獻特刊》一九三五年十月，報告第四頁。

位。一九二四年十一月，馮玉祥率領西北國民軍將溥儀趕出紫禁城，由當時的社會名流學者組織成立清室善後委員會接管故宮，並點查故宮文物。一九二五年十月，故宮博物院成立，取代清室善後委員會。自此封建王朝的宮殿成爲對外開放的學術文化機構^(二)。故宮博物院最初下設古物和圖書兩館，圖書館又設文獻和圖書兩部。這時的圖書館由陳垣主持，文獻部起初由許寶衡負責，後由沈兼士負責。一九二七年十一月故宮博物院改組，文獻部改爲掌故部，由沈兼士主其事。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後，故宮博物院從行政上隸屬於國民政府行政院。一九二九年，故宮博物院再次改組，易培基任博物院院長，下設文獻、圖書和古物三館，另有總務和秘書兩處。文獻館設正副兩個館長，正館長爲國民黨要員張繼，副館長是沈兼士，實際上是沈兼士主持業務。自此以後，故宮博物院結束了顛簸流離、不斷改組的歷史，行政組織基本穩定下來。一九三三年『易培基盜寶案』發生後，易氏下臺，著名金石學家馬衡接任院長一職，三館不再設立副館長，文獻館館長由沈兼士擔任。

故宮博物院作爲文化學術機構的重要表現還在於延聘學術界知名學者作爲專門委員，由院長親自聘任，成立各種專門委員會，以指導全院各項工作。《故宮博物院組織法》第十七條規定：『故宮博物院因學術上之必要得設各種專門委員會。』^(三)故宮博物院各專門委員會主要工作是就院內各項工作給予學術指導。一九二九年六月，文獻館專門委員會成立。據《故宮專門委員會章程》，文獻館專門委員會爲史料審查委員會，主要是審查編輯出版的史料，同時也指導文獻館其他各項工作，如檔案的整理、陳列展覽等。據《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一覽》記載，當時文獻館專門委員有：陳垣、朱希祖、徐炳昶、吳承仕、朱師轍、許寶衡、陳寅恪、傅斯年、羅家倫、周明泰、齊宗康、馬廉、劉復、翁文灝、趙萬里、鋼和泰（俄）等。而後，孟森、顧頡剛、葉恭綽、蔣廷黻等也被聘爲文獻館專門委員。這些專門委員多爲當時史學界知名學者。文獻館各項工作由館長會商專門委員進行。

(二) 單士元：《從皇宮到博物院——紀念故宮博物院建院六十週年》，紫禁城出版社，一九九〇年，第一七二頁。

(三) 故宮博物院：《北平故宮博物院十八年工作報告》，第五頁。

北京文化學術機關中，文獻館所藏明清檔案數量最大。文獻館館藏除了檔案外，還有輿圖、實錄、聖訓、起居注、玉牒，以及乘輿儀仗、冠服盔甲、樂器戲衣等物品。其中館藏最重要者當屬檔案。這裏所說的『檔案』專指文書檔案，主要包括宮中各處檔案、軍機處檔案、內閣檔案、內務府檔案、宗人府檔案、清史館檔案及端方檔案等七類。文獻館集中、接收上述七類檔案的工作進程如下：一九二五年十月，開始集中宮中各處檔案。十一月整理宮中雍正繳回硃批奏摺，十二月提取宗人府檔案；一九二六年一月，向國務院接收軍機處檔案，八月提取內務府檔案；一九二八年六月，接管清史館檔案；一九二九年，點查內閣大庫，八月開始全面整理宮中檔案，九月接收刑部檔案；一九三一年一月開始整理內閣大庫檔案；一九三三年六月開始整理內務府檔案；一九三四年十二月開始整理昇平署檔案；一九三七年四月開始整理宗人府檔案^(一)。一九二九年以後，故宮博物院確定其職責有三項：一是整理宮內各處古物、圖書、檔案及維修各處宮殿；二是舉辦陳列館；三是編輯流傳史料。相應地，文獻館也確定了館內檔案工作的三大職責：整理編目、編輯史料和陳列展覽，這三項職責處在同等的地位。

近代明清檔案學者比較普遍認為，中國古代重視利用檔案編修各種史籍，對檔案本身則並不十分重視。如沈兼士說：『魏荀勗《中經新簿》中之丙部，有舊事、皇覽簿、雜事等，《隋書·經籍志》史部有起居注、職官、儀注、刑法、簿錄等類，大率皆是當時之檔案文書。……後代私家著述漸盛，公家之檔案反形落沒。唐宋以來目錄書中著錄之書籍日增，而一切政學來源記載鼻祖之檔案，士大夫反不屑道及，只為各衙署中錄事小吏之徒所掌管，偶備檢查而已。閱清代公私載記，每每見銷燬檔案之事，可知其不重視之程度了。』因之，近代學術機關從事大宗歷史檔案的實體整理並沒從歷史中尋找到多少經驗可供遵循，其整理方法完全是在整理實踐中逐步摸索出

(一) 參見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北平故宮博物院文獻館一覽》，一九三三年，第二一五頁；《沈兼士學術論文集》，第三四七—三四八頁；單士元：《故宮博物院文獻館所藏檔案的分析》，《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一九三四年五月第二卷第二期，第二七一頁。

來的。清代對於內閣大庫檔案的整理情況可以通過內閣所編檔冊目錄反映出來。例如，當時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藏嘉慶年所編內閣東大庫檔案目錄——《清查東大庫分類目錄》，就是其中一個值得肯定的檔案分類。該目錄分為太上皇帝表文類、徽號類、元旦類、長至類、萬壽類、三節表底類、平定慶賀類、諭旨類、詔書類、敕書類、冊封類、封號美名類、大行類、祭告類、謚號類、折奏類、散館類、文殿試類、武殿試類、考試類、稿案類、檔冊類、來文類、雜項類、外藩表文類等共計二十五類。故宮博物院文獻館館員方蘇生謂：『每類之中，又多以年代為序，排列清楚。這在當時的分類法中，可稱難能可貴。我們初期的研究檔案分類時，雖未曾參考此目；而盡我們的思慮所得結果，亦未能超過此法之上。』^{〔三〕}《清查東大庫分類目錄》主要是按照文種來分類，不同文種的文書載體形態和文字程式是不同的，這樣的分類方法恰是北京大學整理檔案的第一個步驟。然北大整理檔案始於一九二二年，而《清查東大庫分類目錄》則發現於一九三〇年代中期^{〔三〕}，也就是說，這個目錄發現時按照形式和時代整理檔案的做法早已付諸實踐了，方蘇生因之謂初期整理檔案並未參考此目。故宮博物院文獻館整理檔案在人員組織上與北大整理內閣檔案直接相承，像當時承擔直接領導責任的陳垣與沈兼士兩位先生都是北大整理檔案的主持人，而且文獻館館員中有不少即是北大文史系畢業生或學生，如文獻館編輯員單士元當時還是北京大學歷史系孟森教授的研究生。文獻館整理檔案方法直接承繼北大整理經驗。由於北大接受檔案僅是內閣大庫檔案，而故宮文獻館檔案包括內閣、宮中、軍機處、內務府、宗人府、清史館及端方等七個不同來源的檔案。整理規模的擴大，促進文獻館加快了實踐探索的步伐，在整理方法和步驟上，更加趨於精進和科學。

文獻館整理檔案的歷史大致可以分為四個階段：

第一階段從一九二五年故宮博物院成立到一九二九年文獻館成立，是為文獻館的拓荒時期。集中和接收宮

〔三〕 方蘇生：《清代檔案分類問題》，《文獻論叢》，一九三六年十月，論述二第三一頁。

〔三〕 參見方蘇生：《內閣大庫書檔舊目補叙錄》，《內閣大庫書檔舊目補》，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一九三六年。

中檔案、軍機處檔案和清史館檔案，並作局部整理。一九二七年一月，開始搜集檔案中重要史料計劃刊行叢編，一九二八年一月《掌故叢編》第一輯出版。

第二階段從一九二九年文獻館成立後至一九三三年故宮文物南遷^(二)，是為文獻館的擴大整理時期。內閣、軍機處、官中及內務府等類檔案，皆開始了大規模的整理。隨着檔案整理規模的擴大，發現的重要史料亦越來越多。一九二九年底《掌故叢編》改為《文獻叢編》，縮小字號，擴大材料，增加了篇幅。一九三〇年又加印了《史料旬刊》。除了編輯史料期刊外，又編輯出版了一些專題史料彙集，如《清代文字獄檔》等。

第三階段從一九三三年故宮文物南遷到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前，是為文獻館的精進時期^(三)。這一時期是文獻館發展史上最重要的時期，整理工作效率提高，計劃縝密。

(二) 一九三一年，日本侵略者侵佔東北，華北局勢緊張。為故宮博物院檔案安全計，故宮博物院計劃擇要裝箱，預備南遷。一九三二年全院總動員，經一年左右的時間準備工作就緒，於一九三三年開始南遷上海、南京，一部分工作人員也跟着這批挑選出來的國寶南遷。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遷至寧滬的檔案亦覺不安全，而後又遷至四川重慶等地。文獻館檔案亦隨之南遷。

(三) 此前三個時期的劃分參見方蘇生《整理檔案方法的初步研究》，為了方便讀者瞭解不同歷史時期文獻館工作情況，這裏將方蘇生總結引述如下：第一時期，約自民十四故宮博物院成立設文獻部起至民十八改組為文獻館以前止，可以名之為拓荒時期。這時期的重要工作是集中宮中各處檔案，為局部之整理；向國務院接收清軍機處檔案，清釐排架；接收清史館檔案及稿本。而選取各項比較珍貴的史料，刊行《掌故叢編》等書。第二時期，約自民十八文獻館成立以後，至民二十二故宮文物南運，可以說是擴大整理時期。可記述的工作很多，略如對於軍機處檔案，是以隨手登記檔與摺包（奏摺奉旨後，軍機處錄副保存，按月分包，謂之摺包）互相校對，各項檔案冊加蓋頁數戳記，以摺包補編隨手登記檔……等項工作。同時編印各項史料，也多數取材於此。對於宮中檔案，則從初步的檢視，分庫度架，以至分別的整理登記及一部分的摘由編目。對於內務府檔案，是把提到館裏的一部分整理登記。對於清史館檔案，是分別整理，登記目錄。對於內閣大庫檔案是清釐登記與分類整理、逐步的進行。其餘如皇史宬、實錄庫、乾清宮的實錄、聖訓及清史館的實錄稿本，實錄庫的起居注，九龍壁的戲衣、切末，昇平署的劇本、曲本，壽安宮的樂器……都分別的整理編目。而在這個時期出版的叢書、刊物，也頗不少。第三時期，約自民二十二故宮文物南運以後，直到近日，可以謂之為精進時期。它的工作效率比較增高，工作計劃也比較縝密。在《文獻館二十二年度工作報告》裏附有許多的將來計劃。民國二十三年七月故宮博物院改組，沈兼士先生與同人約，以普遍整理為原則，負起文獻館應有的使命來，其工作方法及成績，具載於每月報告及二十三年度報告中。（方蘇生：《整理檔案方法的初步研究》，《中國近代經濟史研究集刊》一九三四年五月第二卷第二期，第八一—八二頁）。

自一九三三年以後，隨着文獻館檔案整理和編纂實踐的進一步深入，文獻館深刻地認識到，此前（包括北大整理檔案時期）在檔案的整理和史料編纂上，存在着一定的缺點和不足之處，即祇顧形式，『過於注重搜求珍奇之史料以資宣傳，而忽略多數平凡材料之普遍整理』^{〔三〕}。對於整理編目、編輯史料和陳列展覽三項職責，館長沈兼士在《文獻館整理檔案報告》中總結出三大工作原則：『整理以不失原來之真相為原則，編纂以普遍編目為原則，陳列以就文物之性質相互連貫照映為原則』^{〔三〕}。

館長沈兼士極力主張要對檔案進行普遍整理。爲了貫徹檔案的普遍整理，他又提出檔案系統分類的主張。他在《方編清內閣庫貯舊檔輯刊序》中說：『曩者雖亦發表若干有價值之史料，率皆零星掇拾，掛一漏萬，不足數也。爰與同人矢志以普遍整理為基本原則，不避繁瑣，不求速效，務使珍奇者，不因破碎而見遺，平凡者可賴統計而有用。故欲作詳密的分類編目……』^{〔三〕}。文獻館館員方蘇生在《清代檔案分類問題》一文中說：『自從沈兼士先生提出了「普遍的分类」與「系統的分类」兩點主張以後，我們已開始共同研究分類法如何系統化——分類問題解決，則普遍的整理，自然不成問題——今後的工作，或可進行到步伐齊一的境地。』^{〔四〕}可見，系統分類是達成普遍整理的關鍵環節。一九三六年，以檔案實體分類和編目為中心，文獻館製定了科學可行的《文獻館整理檔案規程》，確定檔案整理原則，『應保存其原件之形式』。

在沈兼士普遍整理和系統分類思想指導之下，文獻館工作人員開始系統研究檔案分類問題，其中館員方蘇生對內閣檔案分類研究和館員張德澤對軍機處檔案分類研究的成績最爲突出。所謂系統的分類，『即不同機關之檔案，各保持其原來系統，分別整理編目，各機關雖有同類檔案，亦不合併，一機關之下，再按其來源或附屬組

〔二〕 沈兼士：《沈兼士學術論文集》，第三五〇頁。

〔三〕 沈兼士：《文獻館整理檔案報告》，《文獻特刊》一九三五年一月，報告第七頁。

〔三〕 沈兼士：《沈兼士學術論文集》，第三四四頁。

〔四〕 方蘇生：《清代檔案分類問題》，《文獻論叢》一九三六年十月，論述二第四〇頁。

織，爲之復分。更仿圖書十進分類法，編訂分類號，每一件檔案，均有其專用之號碼，覩一號碼，即可知其層層之門類，可免冠漢字之繁複，且隨時發現，均可編號續入，不致牽動全目」^{〔三〕}。這一分類方法，亦即現在檔案學中以來源原則整理檔案的方法。在此理論和實踐探索的基礎上，文獻館集合衆力，編製了一個系統的檔案分類表，即《文獻館所藏檔案分類表》。

此一時期，在史料編纂方面，除了繼續編印各種史料外，還編製了各種檔案目錄，如《清軍機處檔案目錄》、《清內閣庫貯舊檔輯刊》、《清季各國照會目錄》等。在檔案陳列展覽方面，分爲普通陳列式和專門陳列式兩種。前者是爲一般參觀者而設，將不同性質文物續紛雜陳，避免單調乏味，以引人矚目。後者是爲專家研究而設，或以機關爲主，或以時代爲主，或事物性質爲主。以綜合系統的方法，表現一個時代政治文化的立體面貌。文獻館此期內，將原有七個陳列室擴充爲十個陳列室，將專門陳列室與普通陳列室並重。據《文獻特刊》（一九三五年），文獻館陳列室有宮中檔案室、慈禧用品室、萬壽圖室、樂器室、兵器室、清錢室、內務府檔案室、昇平署戲曲室、圓明園燙樣室、造辦處輿圖室、內閣大庫檔案室、軍機處檔案室等。

第四階段從一九三七年抗戰爆發到新中國建立前，是爲文獻館困頓時期。北平淪陷後，故宮內冷冷清清，大門緊閉。抗戰勝利以後，南遷檔案文物還未來得及返回，內戰風雲又起。這個時期文獻館陷入艱難困頓，各項工作收效甚微，未能取得突破性進展。

文獻館在近代明清檔案整理運動中，不僅在明清檔案整理實踐和理論研究上取得了絕對優勢的成績，而且在二十世紀二十至三十年代開始的第一次明清史料公佈高潮中，文獻館以其明清檔案的大宗館藏及人才優勢，成爲推動這次高潮的主力軍。據統計，文獻館時期出版有關史料書籍刊物，凡四十六種，臚列如下：《掌故叢編》（十冊，一九二八年一月至一九二九年十二月）、《文獻叢編》（四十六冊，一九三〇年三月至一九四三年一

〔三〕 張德澤：《檔案分類研究》，《文獻論叢》一九四八年十月，論述二第五七頁。

月)、《史料旬刊》(四十冊,一九三〇年六月至一九三二年七月)、《清代文字獄》(九冊,一九三一年五月至一九三四年十月)、《清三藩史料》(六冊,一九三一年十月至一九三二年二月)、《清代外交史料(嘉慶朝)》(六冊,一九三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三二年十一月)、《朝鮮迎接都監都廳儀軌》(一冊,一九三二年一月)、《康熙與羅馬使節關係文書》(一冊,一九三二年三月)、《清光緒朝中日交涉史料》(四十四冊,一九三二年三月至一九三二年十月)、《清光緒朝中法交涉史料》(十一冊,一九三二年十月至一九三三年二月)、《清代外交史料(道光朝)》(四冊,一九三二年十一月至一九三三年五月)、《清宣統朝中日交涉史料》(三冊,一九三三年二月至一九三三年六月)、《朝鮮國王來書》(一冊,一九三三年二月)、《太平天國文書》(一冊,一九三三年四月)、《阿濟格略明事件之滿文木牌》(一冊,一九三五年五月)、《故宮俄文史料》(一冊,一九三六年十月)、《清季教案史料(一)》(一冊,一九三七年)、《蘇州織造李煦奏摺》(一冊,一九三七年)、《清季教案史料(二)》(一冊,一九四八年)、《清軍機處檔案目錄》(一冊,一九三〇年一月)、《雍正硃批諭旨不錄奏摺總目》(一冊,一九三〇年八月)、《文獻館現存清代實錄總目》(一冊,一九三四年十一月)、《清內閣庫貯舊檔輯刊》(六冊,一九三五年一月)、《清季各國照會目錄》(一冊,一九三五年一月)、《內閣大庫現存清代漢文黃冊目錄》(一冊,一九三六年四月)、《清內務府造辦處輿圖房圖目》(一冊,一九三六年五月)、《清內閣舊藏漢文黃冊聯合目錄》(一冊,一九四七年)、《交泰殿寶譜》(一冊,一九二六年十月)、《清代帝后像》(一冊,一九三一年九月)、《清乾隆內府輿圖(銅版地圖)》(一匣一〇四幅,一九三二年一月)、《印璽明信片》(一九三二年七月)、《重整內閣大庫殘本書影》(一冊,一九三三年十一月)、《臺灣風俗圖郵片》(一九三四年二月)、《廣西沿邊各營駐防中越交界對汛法屯距界遠近圖》(一冊,一九三四年六月)、《歷代功臣像》(一冊,一九三五年十月)、《乾隆朝京城全圖坊巷宮殿考》(一匣,一九三六年)、《讀書堂西征隨筆》(一九二八年七月)、《籌辦夷務始末(道咸同三朝)》(一三〇冊,一九三〇年一月)、《名教罪人》(一冊,一九三〇年四月)、《清太祖努爾哈齊實錄》(一冊,一九三一年二月)、《清太祖武皇帝努爾哈齊實錄》(一冊,一九三二年一月)、《多爾袞攝政日記附司道職名冊》(一冊,一九三三年十二月)、《碎金》(一冊,一九三五年五月)、《昇平署岔